



图为羌笛演奏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句，让羌笛声名远扬。

羌族没有文字历史记载，羌笛承担了以音律传承族群记忆的重要作用。它曲调哀婉悠扬，至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是我国最古老的单簧气鸣乐器。由于制作工艺复杂、演奏难度较高，依赖口传心授、缺乏乐谱体系，至21世纪初，全国精通技艺者不足10人，且多高龄，一度成为濒危技艺。2006年，羌笛演奏及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守住“冷板凳”上的匠心

“制作羌笛，要选用羌山海拔2500米以上特有的高山箭竹，手工十八道工序才能完成。”7月的川西高原，阳光炽烈，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的一间暑期教室里，61岁的四川省羌笛吹奏及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何王金正在授

全国精通技艺者一度不足10人 千年羌笛“新”声夺人

课，望着座位上一张张稚嫩的脸庞，不由得想起当年求师拜艺时的自己。

1989年，20岁出头的何王金了解到在四川羌族地区，羌笛技艺几近失传。在县里艺术团工作的他决心专注羌笛技艺学习，奔赴百里，冒雪前往亚都乡四寨向何克芝拜师，“整整坐了5个小时汽车，还走了20多公里山路，雪深有膝盖那么高。”寒冬里，何王金每天到河边练习羌笛吹奏，冻得嘴巴干裂，持续十余天之久。精诚所至，他终于被收入师门。自此，他便一头扎进了羌笛世界，这一守，就是30多年。

在羌笛传承谱系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龚代仁、雅都乡四寨的何克芝，在民间被分为“龚派”与“何派”。羌笛演奏采用的“鼓腮换气法”要求一气呵成，整首乐曲无论长短都不能停顿，其间还需运用喉头颤音、手指滑音等技巧，传承之路异常艰难。2008年汶川地震更导致数名传承人遇难，加剧断层危机。

“当时北川地区数十名羌笛吹奏者遇难，幸存者中能演奏者不足10人，制作技艺传承

人仅剩4人。”何王金称，受地震影响，他自1990年起耗时18年收集的10余首古老曲谱在灾后搬迁中遗失近半，“曲子都是通过各个羌寨中老人口述记载，随着老人的逝去，那些遗失的曲谱，永远都找不回来了。”心痛之意溢于言表。

龚代仁出生于1934年，13岁便随父亲学习这门祖传技艺。1983年对传统制作工艺做出关键改进，提升了音准与音色，使羌笛能演奏完整乐曲。现任阿坝州羌学会常务副会长、羌笛演奏及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海元便是他收入门中的首位弟子。

“学习羌笛很难，要把它学精、学透需要花大功夫，在困难考验下半途退缩的人很多。”陈海元出师后始终致力于传承人培养。他感到，时代在发展，文化在创新，要让一款具有悠久历史的独特乐器焕发出勃勃生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越是艰难，越是要守住这个‘冷板凳’，才能确保羌笛技艺延续。”

在创新发展中破壁突围

数十年来，何王金充分利用送文化下乡机会，在羌族聚居区以及还有羌笛这门乐器存在和曲目流传的地方共收集、

整理30多首古羌笛曲目，出版的《羌笛演奏及制作技艺》一书，填补了“羌笛”这一古老民族民间乐器没有专门、系统介绍演奏及制作技艺理论的空白。不仅如此，面对传承断层的危机，他做出了大胆决定——打破“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在获得恩师何克芝允准后，他开始广收学生。大浪淘沙，在这条守艺路上等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人，袁永杰便是其中之一。

距茂县200公里外的阿坝师范学院实验室里，汉族教师袁永杰正调试着一台精密仪器。他右手食指上，一道被电刨机割伤的疤痕清晰可见——那是改良羌笛付出的代价。

袁永杰来自甘肃，2014年到阿坝任教，初闻羌笛音色便被震撼，随即拜师何王金。因有着竹笛吹奏经验，很快便掌握了吹奏技巧。在一次与现代乐队合奏演出时，他发现传统羌笛因按孔方式随意导致音准偏差，便在何王金的指导下，运用专业乐理知识“波长原理”重新排列孔距，将羌笛传统的六孔音阶改为七孔音阶，在原来的六孔七个单音阶基础上新增了一个八度音阶，使羌笛的音域加宽，不仅能演奏流行音乐，而且可以和现代乐队进行合奏，获得《新型音准型羌笛》专利。2021年，他又通过创新腔体结构，发明“单口演奏型”专利，解决哨片易湿、儿童误吞等问题，使学习门槛至少降低了60%。

“我们学院现在专门设置了‘羌笛制作技艺与演奏虚拟仿真实验’课程，让学生们通过

‘打游戏’的方式，全流程了解这门技艺。”袁永杰表示，羌笛绝技不仅需要“师带徒”式的活态传承，还需要通过创新形式，让其在普通大众身边传播，这样才能将文化基因保留下来。

呼唤更多“接力者”加入

“不仅是高校，非遗进校园还延伸至小学，这为羌笛技艺传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自20世纪90年代，陈海元便会利用寒暑假，在茂县开办免费授课的羌笛演奏班，但由于教学模式相对简单，无法形成体系，学员可持续性难以保证，效果并不如预期。

“羌笛的活态传承依赖面对面教学，而精熟技艺者日益减少，现代流行音乐的冲击更让传统艺术难以吸引年轻群体。”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理事张大彤过去20年，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音乐，尤其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传统音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她认为，“传承人+学者+教育工作者”合作机制，可为羌笛等传统乐器非遗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方向。

近年来，阿坝州在非遗文化保护方面不断加大力度，通过实施人才培养计划，为传承人传承能力建设提供支撑；多方筹措资金，为传承人有效保护和传承提供资金支持；保护与利用并举，为传承人提供良好的空间氛围；拓展“非遗进校园活动”，为传承人队伍建设提供新模式……

“在这些政策加持下，羌笛技艺传承乘势而行，获得了极为有利的发展空间。”陈海元在实践中深刻感受到，技艺传承必须与时俱进，才能赢得年轻人的关注，“我们特别渴望越来越多羌笛技艺传承‘接力者’的加入。”

李娜 潘文范
(摘自《工人日报》)

布东南亚，包公故事亦在异国生根。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包公庙，承载着当地华人对“公正”的集体向往；缅甸曼德勒的华人社区里，《铡美案》

《三口铡》等故事是长辈们口耳相传的德育教材；《包青天》系列剧集更通过电视荧幕走进寻常百姓家。

“学生们会主动在中文演讲比赛里讲包公故事。”在缅甸曼德勒孔教学学校任教九年的华裔第三代武绍云，深切感受到这种文化浸润。“包公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安徽包公研究中心主任许高彬的话，道出这份文化认同的根源——刚正不阿、爱民如子的精神内核成为海内外华人共同的精神标识。包公故事正以多元形式续写“凡有华人处，皆能话包公”的传奇。 赵强
(摘自中新社)



云南昆明河泊所遗址

解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叙事

“我们在河泊所遗址发现一条‘T’字道路，路旁分布着建筑区、水井等遗迹，根据道路指向找到了魏晋时期的城墙……”近日，在考古发掘现场，随着河泊所遗址项目组成员(现场发掘)谢霍敏的介绍，一座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城市鲜活了起来。

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是商周至汉晋时期云南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这里既是古滇国的都邑，又是西汉益州郡郡治所在地。该遗址的考古成果填补了西南边疆历史研究的空白，见证了边疆与中原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揭示了西南边疆从多元文化到国家一体的发展历程。

“滇王离难西南夷……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古滇国的存在，以及汉武帝在西南地区设置益州郡的历史。不足千字的史料，同时缺乏实物佐证，让神秘的古滇国是否真实存在，益州郡郡治到底位于何处，成为待解的千古谜题。

“1956年，‘滇王之印’金印在石寨山古墓群出土，证实古滇国真实存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河泊所遗址项目负责人蒋志龙说，但在

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中，“滇”的聚落遗址一直未被找到。

在大批考古工作者的长期努力下，2021年以来，河泊所遗址东部发现汉晋时期城墙、壕沟、道路、大型高台建筑基址，出土筒瓦、板瓦、瓦当、砖等建筑材料70余吨。其中，有“益州”字样的铭文瓦当和“永元三年官当”字样的纪年瓦当，成为益州郡城址确认的有力证据。

“在古代河道边缘的灰灰堆积中，出土2000多枚封泥，我们由此推测这里曾是集中销毁官方文书的场所。”谢霍敏说。

封泥是中国古代用于封缄简牍文书并加盖印章的泥团，在官方文书资料被焚烧时发生陶化，因此被保留下来。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封泥中，大部分是官印封泥，包括“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益州刺史”“广汉太守章”“蜀郡太守章”等，证实史料中“西汉置益州郡，领二十四县”的记载。

蒋志龙解释，这些官印封泥的发现，说明汉王朝在古滇国故地设立益州郡后，仍保留滇国滇王称号及统治，并以“相”相辅进行地方治理的双重行政管理模式，体现中央政权边疆治理策略的灵活性。

值得一提的是，河泊所遗址还出土简牍5万余枚，其中

有字简牍1.4万余枚，内容涉及文告、官方往来文书、司法文书、名籍、书信、典籍等，成为研究汉代边疆政区建制、职官制度、赋役制度、民族关系等问题的重要史料。

“这些简牍上的文字让历史更加具象化。例如一片简牍记录着‘己丑滇池守令邪龙长武、守丞’，表明当时出现了一位名为武的官员从邪龙县到滇池县跨地区任职的情况。”河泊所遗址项目组成员(简牍保护)苏东晓介绍，这批简牍文书是西南地区迄今考古发现的最大一批汉代文字资料，对研究秦汉之际的边疆治理及国家化进程具有突出重大价值。

“河泊所遗址的发掘成果实证了西南边疆自古以来的国家认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叙事的成功典范。”蒋志龙说。 韩帅南(摘自中新社)



考古人员在河泊所遗址内工作